

质量管理丛书

效率与效益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问题

刘源张 著



科学出版社

本书获得华罗庚-吴文俊数学出版基金资助
质量管理丛书

效率与效益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问题

刘源张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本阐述劳动生产率的著作。内容包含理论、方法及应用,对宣传和普及生产率知识,进而发展国民经济有重要意义。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师生,以及企业界人士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效率与效益:中国工业生产率的问题/刘源张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3

(质量管理丛书; 1)/刘源张 主编

ISBN 978-7-03-039932-8

I. ①效… II. ①刘… III. ①工业生产-劳动生产率-研究-中国
IV. ①F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9390 号

责任编辑:王丽平/责任校对:张怡君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王 浩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4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 3/4

字数: 200 000

定价: **6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1989年我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第一个重大项目“我国工业生产率的管理理论与方法研究”，1994年通过验收评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报》1996年6月12日第19期称此项研究“为解决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提供思想、理论和方法，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2002年中国工程院呈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咨询研究报告《新世纪如何提高和发展我国制造业》指出，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这一事实造成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差和经济效益低，因此，必须改进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和管理。

2005年，我向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申请咨询项目“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管理的研究”立项，同年获得批准，并得到资助。从1994年到2005年的十年正是我国国民经济急速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工业企业高速成长，在技术组织、管理上得到提高，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而待改进问题的时期。我自己也是在1995年被选进国际质量科学院，2001年被选进中国工程院，接触到更多不同领域国内外专家、学者。一方面是来自企业现实中的感受，另一方面是受自中外学者的启发，这两方面促使我重新思考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2013年6月28日以全票通过中国工程院验收答辩。

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早已有之。经济学和管理学这两门科学可以说是从研究这一课题开始的，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或多或少最后都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对于普通老百姓更是重要，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好坏要取决于他们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劳动生产率对于政党和政府也同等重要，因为政治、经济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劳动生产率。至于企业家，他们经营企业的职责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无论从理论或实际上说没有其他什么课题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中国学界对于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更加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许多国外学者也参与进来。中国的《宪法》对劳动生产率有明确的要求，中国的各个“五年计划”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都制定了目标。中国对劳动生产率始终给予很大的重视，颁布有关的法规，采取有效的措施。劳动生产率一向是国家

统计定期公布的用来考核企业的一项主要指标^①。

对有如此重要意义，又涉及许多学科和许多实际方面，而且已有如汗牛充栋的大量文献的课题，我们应如何研究，这是从立项时就考虑的问题。劳动生产率的课题研究必须兼顾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劳动生产率首先是个实际问题，理论是后来逐步发展的。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本质和原因固然必要，这些事不讲清楚，很难说服领导和群众去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观察劳动生产率的实际表现，调查人们对它的态度，却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和基础。我们称这样的研究方式为实证研究。其次，经济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中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更确切地说，是对提高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观点；对提高的方法提出我们的建议。我们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源泉在于企业和它的经营者、管理者和劳动者。当然，国家政策、市场变化对它有影响。不过，正像常常使用的一句行话一样，“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是企业的这些人员，是他们的意识和行动。因此，我们的研究路线是管理学的。但是我们对研究却引用了相当多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远远早于管理学家，后来的总是受先行的恩惠。另外，劳动生产率是从企业开始逐级上报层层积累到国民经济的统计上去的，如果不明确这中间从企业到行业，再到整个国民经济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就不容易了解劳动生产率的本质和原因。但是，我们并不依赖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因为他们是去研究国民经济增长问题时使用生产率加以测度，而我们则是研究劳动生产率本身和提高它的具体方法。谈到“具体”，虽然我们的研究必然涉及管理的技术方面，其中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 IE）是主要的，但只是点到为止。研究的重点还是管理本身。

毋庸讳言，从已有的成果看，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研究确实不如国民经济增长研究对生产率的处理那么华丽，那么多样。但企业中的劳动是朴实的，企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是货真价实的，而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也应该是脚踏实地的，应从小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也能够如此，但却有不少力不从心的难处，只有留待以后的补充。

感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院管理学部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延续我在国内开拓的劳动生产率研究。还要感谢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原学部主任殷钰

^① 国家统计局、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定期公布若干重要经济指标的暂行规定》决定自1989年1月起实施，公布以下指标：固定资产透支额；银行贷款余额及增加额；职工工资总额；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工业销售利税率；工业资金利税率；工业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工业能源消耗综合降低率。

瑞院士和现学部主任王礼恒院士的鼓励。资助是必要条件,因为没有资助,研究不可能开始。鼓励是充分条件,因为有了鼓励,研究才能完成。任何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充要条件,都是不可能进行和完成的。

刘源张

2013年9月

绪论	1
第1章 生产率的认识和问题	14
1.1 生产力与生产过程	14
1.2 生产率	15
1.2.1 生产率的定义	15
1.2.2 生产率的主体	16
1.2.3 生产率的特点	17
1.3 生产率的有关问题	20
1.3.1 就业与失业	20
1.3.2 工资与物价——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33
1.3.3 老龄化社会与劳动生产率	41
注释	42
第2章 生产率的理论与测量	51
2.1 生产率的形式和实质	51
2.1.1 实物生产率、价值生产率与单位能耗	53
2.1.2 产出值的表示——总产值、净产值和增加值	53
2.2 生产率体系	56
2.2.1 实物生产率	56
2.2.2 价值生产率	57
2.2.3 总指数生产率	59
2.2.4 全要素生产率	63
2.2.5 能效、技术质量和质量问题	74
2.2.6 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	77
2.2.7 生产率、多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81
注释	84
第3章 中国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91
3.1 中国国民经济的成长情况	91
3.2 中国工业企业增长的效率与数量	92
3.3 中国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94
3.3.1 指标统计与全员劳动生产率	95

目 录

绪论	1
第 1 章 生产率的认识和问题	14
1.1 生产力与生产过程	14
1.2 生产率	15
1.2.1 生产率的意义	15
1.2.2 生产率的主体	16
1.2.3 生产率的性质	17
1.3 生产率的有关问题	21
1.3.1 就业与失业	22
1.3.2 工资与物价——劳动生产率的作用	33
1.3.3 老龄化社会与劳动生产率	41
注释	42
第 2 章 生产率的理论与测算	51
2.1 生产率的形式和实质	51
2.1.1 实物生产率、价值生产率和单位消耗	52
2.1.2 产出值的表示——总产值、净产值和增加值	53
2.2 生产率体系	56
2.2.1 实物生产率	56
2.2.2 价值生产率	57
2.2.3 总和生产率	59
2.2.4 全要素生产率	63
2.2.5 指数、权数和质量问题	74
2.2.6 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	77
2.2.7 生产率、多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	81
注释	84
第 3 章 中国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91
3.1 中国国民经济的成长情况	91
3.2 中国工业企业增长的效率与效益	92
3.3 中国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94
3.3.1 指标统计与全员劳动生产率	95

3.3.2 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96
3.4 技术的进步与管理改善	98
3.4.1 机器设备再制造	98
3.4.2 信息化与知识管理	98
3.4.3 不同所有制的影响	99
注释	101
第4章 企业劳动生产率	103
4.1 企业的生产与管理	104
4.2 企业管理与劳动生产率	105
4.3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与生产率	108
4.4 生产率的正指标与逆指标	111
4.5 标准、规范、定额的意义	114
4.5.1 标准的分类与性质	114
4.5.2 标准的制定与修订	115
4.6 劳动定额与劳动者生产率	116
4.7 实际论证	121
注释	129
第5章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国民运动	132
5.1 生产率思想的发展	132
5.2 日本生产性本部和日本生产率运动	134
5.2.1 理念的深化	134
5.2.2 重要的成就	136
5.2.3 重点工作	138
5.2.4 与中国的关系	138
5.3 西欧与北美的生产率运动	139
5.3.1 英美的劳工运动和组织	139
5.3.2 英国生产率中心和英国的生产率运动	140
5.3.3 美国的生产率问题	142
5.3.4 附言	144
5.4 结语——开展提高生产率的国民运动	145
注释	145
后记	147

绪 论

生产和消费是人类生活的永恒动力。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一个社会人民生活的改善，从生产的方面说，要靠能够用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多的产出，从消费的方面说，要看能否充分和有效地满足需求。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解决此项矛盾的任务取得了显著成绩。从“六五”到“十一五”，经过三十年奋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4545.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8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1980年的363元增加到2010年的29700元，按当年汇价换算，大约4570美元。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可达10%^[1]，可谓世界经济奇迹。

然而，在我们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中还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是生产企业的效率和效益的问题。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工业企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是工业企业创造的，国家财政收入的30%以上是工业企业提供的，社会资产的80%以上是工业企业所有的。这是工业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支柱和主导作用的具体体现，也有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从经营管理的角度看，工业企业的大多数尚未摆脱粗放的增长模式，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产品品种和质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二是企业素质不高，以致劳动生产率低下；三是生产方式落后，导致物资、能源消耗过高；四是科技进步速度慢、科技含量低，以致产品附加值低；五是成本控制不善，造成浪费。这种粗放式的经营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建立、健全的形势下，在国内国外企业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难以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针对这一问题，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提出了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到集约型上来的重要方针。所谓粗放，就是经济增长是靠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的投入增加而不讲求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取得效益；所谓集约，就是不靠或适当增加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而想方设法去提高它们的效率和效益。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改革经济体制，以形成有利于提高效率、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纲要》明确指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这是在深刻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完全符合国有企业实际情况需要的，是我国工业企业改革的方向。

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四件事当中，前三件是重要的条件，是最后一件“管理科学”的前提，没有前三件，“科学管理”无法下手。但是，这前三件都有了，却没有管理科学，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达不到它所要求的提高效率和效益的目的。所谓集约，最后要靠“管理科学”去完成。这就是《纲要》强调的，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的理由，当前，人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清晰”和股份、公司之上，而忽略“管理科学”，这就更加需要指出，明晰产权是企业改革很重要的一条，但是光凭“产权清晰”这一条还是不足以把企业搞好。“管理科学”是不会随着产权清晰了，就自然而然上去的。总之，缺了“管理科学”这一件，现代企业制度是不能真正建立起来的。那么，“管理科学”又是什么呢？很长时期，许多专家、学者都为它的内容绞尽脑汁。本书也在第1章的注释中稍微作了概要的说明。不论对它的内容作何种的分类和叙述，“管理科学”的真正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活力，而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活力存在于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活动上，表现在企业全员的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劳动生产率上。从企业经营管理的要素说，对它的表现要有与国民经济统计不同的性质上的理解。这是本书力图说明的要点。为了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企业标准、定额的制定、修订和贯彻实施是“管理科学”能够提供的一种方法和制度。再说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是孤立的，是与其他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联系在一起而互有影响的。一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将会促使另一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可以说，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的可靠途径和可信凭证。

二

生产率已是全世界各国关注的紧要问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资谈判和纠纷、国际合作或摩擦等都取决于或涉及生产率的高低问题。为此,有关机构经常进行生产率的国际比较。早在 1981 年,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联席会议经济委员会发表报告警告说:美国正面临着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挑战,可能逐步丢失国内外市场,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正在赶上或超过美国^[2]。十年之后,这一警告变成了现实,美、日之间的摩擦从以往日方的忍让演变成互相指责,甚至日本内阁成员对美国工人斥之为懒散,进而引起争议。实质仍是生产率问题,正如美国《新闻周刊》1991 年 7 月 22 日的一期中所说的,美国最该担心的经济问题还是美国公司和工人的生产率。日本经济 60 年代的高速增长、70 年代之能够安然渡过两次石油危机、80 年代仍能克服日元升值的威胁维持其经济大国的地位,都全靠日本生产率的迅速和稳定的提高。而在面临全世界市场竞争激化的今天,日本也对自己的生产率表示忧虑。2007 年日本政府为了恢复国家的经济活力,提出要在五年内将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由目前的 1.6% 提高到 2.4%。

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展现并加速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全球化。朱镕基总理在 1998 年 9 月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联合召开的年会上讲话时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和世界经济连在一起了”。2001 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另一个是信息化。2000 年到 2003 年的这段时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有过一个快速的提高,麦肯锡全球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认为,信息技术所带动的整个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其根本原因。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2006—2020 年国家信息发展战略》强调了信息化带动产业化的产业政策。这两个变化给劳动生产率导入了新观点。生产率是对生产要素而言的。过去,生产要素是土地、资金、劳力的“老三件”,现在,生产要素是知识、信息、管理的“新三件”。这种认识扩展了劳动生产率的研究视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六个生产要素已经在全球的范围内可以获得,因而产生流动或者转移了。这种流动和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又产生了影响。而经济发展、贸易增长,无一不受劳动生产率提高或降低的影响。国家政府、议会和企业之间,虽然使用各种不同的限制、反限制的名目和措施,最根本的还是生产率上的较量。用美国生产

率和质量中心主任 C. J. Grayson 博士的话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生产率问题那样对国家经济影响之大。它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水平和国际竞争的地位，影响着通货膨胀率和就业。”

中国的情况既类似又特殊。新中国的成立，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很快的提高。由于人口多、底子薄，虽然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但是生产率绝对水平仍然很低。由于传统生产方式与现代生产方式并存，再加上价格体系的不合理，部门间的生产率极不平衡，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经济政策、政府规章制度的变动，生产率起伏较大。更由于配套改革和综合治理的不尽人意，生产率同其他国民经济指标或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很不协调。1983 年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今后五年必须继续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城乡人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198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指出：“这几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的幅度，已经超过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1986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强调：“生活消费的增长速度不能高于生产发展的速度，职工工资提高的速度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1987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复强调：“在正常情况下，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不许低于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以后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总理都以“经济效益”替换了“劳动生产率”。这是否因为“劳动生产率”难懂而“经济效益”易懂的原因呢。但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提倡的“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质量”，最后只有定量地落实到“劳动生产率”上，才有具体的内容。政府有义务向人民解释、宣传“劳动生产率”。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解释和宣传这个极其重要的概念。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生产率问题的研究更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但要解放生产力，而且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前人所未遇到的经济和管理上的问题。如果说重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那么这种公有制应该如何体现呢？如果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效率和公平要有所取舍或有缓急先后，那么，它应根据什么准则去判断呢？在生产率问题的研究中，生产率究竟是什么？生产率与生活福利有什么关系？生产率应怎样去提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在这些问题的背景下讨论才是有益和有效的。生产率问题的研究本来源自资本主义

发展初期^[3]，无论是基础概念还是分析方法都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人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私人企业的完全竞争的假设上的。国内学者多以此为戒而不肯轻易随从。更何况，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生产率问题的研究在分析方法上虽日趋精致，但却在概念的解释、度量的误差、现象的诊断上说法各异。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基础概念的探讨开始，结合我们自己的需要进行独立的研究。当然，我们并不全盘否定西方学者的见解，有时我们也要借鉴。不过，无论如何，我们研究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生产率，而不是其他。

我国生产率问题的讨论从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接触到了西方学者的论著，80 年代中有了较多的研究。其间在概念上、方法上、结论上都有较大的争论。对于生产率的性质，是效率，还是效益；对于生产率的主体，是对个人、企业和社会而言的，还是对生产方式而言的；对生产率的含义，是只有活劳动，还是物化劳动；对于生产率的比较，不同部门之间是能比较，还是不能比较；对于生产率的变动，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而对于我国工业生产率来说，是在提高，还是有待提高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有些可能只是用语上的差异，有些却是实质性的分歧。我们的研究是澄清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恰是在国内外学者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对此，更有意思的是，学界有如此长期的讨论^[4]；政府有上述明确的指标，并且反映在各个时期对工业企业的考核指标上^[5]；而且我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6]、法规都曾明文规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尽管如此，我国的企业界，甚至主管当局^[7]，以及舆论界是否对此给予重视却是一个疑问。根据我们于 1989 年 7 月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和 1990 年 3 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别在上海地区和哈尔滨地区向企业厂长、经理和企业管理干部近 300 人的问卷调查和座谈的结果，2006 年和 2009 年两次由东华大学对上海地区小部分企业又做了问卷和访谈的补充调查，感到大多数企业对这一指标并不关心，更不用说如何分析、利用这项指标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了。此调查结果清楚地说明，生产率意识在我国还是相当薄弱的^[8]。这就是有关生产率的国情，它一直贯穿于我们研究的始终。

三

生产率是可以从宏观(即国民经济或全社会)和微观(即企业)两方面去把握

的，多数研究属于前者。因为是从讨论国民经济的发展机理或增长原因而涉及生产率问题，所以是从总量统计入手分析。无论是研究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是研究社会生产率，都是为了了解国民经济的真正实态和预测它的趋向。从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收入算出的生产率固然有一定的意义，例如进行国际比较，但是要了解国民经济的实态和趋向，归根到底是要从构成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民，即消费者和企业，亦即生产者的双方的情况而判断的。从这个观点看，对消费者最有意义的是实际工资或收入。改革开放以来，它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是不协调的，它的支出结构和这种结构的趋向也有问题。同样，我们国家企业的经济效益，从全体看，不够理想，而协调一直是企业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所追求的重点目标。城乡居民的工资收入高低取决于全国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居民收入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全民的劳动生产率。本书要说明的正是这一认识，从另一方面说，生产率的研究不只是计量的问题，更重要的应是如何提高和提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当然，正如在本书中对部门生产率所作的分析那样，从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和掌握生产率情况也是有用的，或者说是不可缺少的，但这只能是个大体的描绘。这是因为，在收集为此所需的总量统计数据的过程中，必然会包含由各种外来影响所导致的误差的缘故^[9]。至于提高，是不能由此看出什么道理和措施的。这就必须到企业中去与作为劳动者的人联系起来。而作为劳动者的人是组织中和在管理下进行生产活动的，我们的研究就要从组织和管理的方法着重阐述。提高生产率有“硬”的一手，也有“软”的一手。人们常说，生产是靠技术与管理两个轮子推进的，所谓“硬”的就是有形的技术，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和无形的技术，如设计、工艺等；所谓“软”的就是指组织、计划和管理。“硬”的很具体、很有限，只能就某一产品、某一工序、某一生产方式讨论，这当然很有用，甚至有时是起巨大作用的。“软”的却很概括，反而能作一般的讨论。不过，所谓“硬”“软”也是相对而言的，技术的内容里有“硬”“软”之分，有形的是“硬”的，无形的可称为“软”的；管理也是如此，其中凡是属于手段的或物理性质的，称为“硬”的，凡是属于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或是哲理性质和数理性质的，称为“软”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认为，要使管理对提高生产率起作用，研究“硬”的固然必要，还有必要从“软”的方面去加强。

在方法论上，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道路。对此，我们希望作一点解释。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管理的角度研究生产率问题，都存在着政治、经济制度这样一个前提和社会文化这样一个环境。如果有必要的话，经济管理的学问既要

在这样的前提下和这样的环境中反映一种经济现实，又要改变这种经济现实。这就发生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区别和联系，管理学不同于物理学，不能把实证与规范分开，更不能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我们对生产率问题作管理学的研究，既是一个学术理论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实践的问题。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在研究的总结时，必须思考我们的提法对于我们的经济制度是有利，还是无利甚至有害。对我们在生产率认识上的当否，对我们在生产率提高方法上的优劣，都要有一个判断。于是，价值观自然就进入了这个判断。这同实证不可避免地要以某些规范为假定一样，对于以人和社会为基础的生产率研究也不能不受到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的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在以劳动生产率的观点寻求主导产业时，就会遇到这种情况。这并不奇怪，过去十多年中，在如何对待个体经济上就曾出现价值判断的问题。不过，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一方面，价值观的确使人对某一经济现象作出一种判断；另一方面，这一经济现象的演变也可能使原有的价值观改变。我们并不否认本研究也是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进行的。

上面我们曾主张应以生产率，而且主要应以企业的生产率，了解国民经济的实态和趋向。这里需要指出，在利用统计资料判断时，要分清三个层次。也就是说，实态的状况，反映这种状况的数据，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拿中医的“辨证论治”来比喻，就是疾病、症状和病因。或者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就是本质、现象和规律。认识症状才确切表示某种疾病，也即要仔细考虑所谓真相、假相的问题，这就是“辨证”。疾病的发生必然有某种原因，经过对症状的诊断而推索出病因，再研究用药治疗，这就是“论治”。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等都是症状的表示。在讨论国民经济实态时，重要的是不能把症状同疾病等同起来。国民经济的实态发生问题，或者国民经济表现异常，首先要判断它将表现在哪些统计数据上，再从这些数据中探明它的原因，其后才有可能提出改善的措施。关键仍是症状的正确判断，也就是经济实态的确切指标。最常用的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或 GDP 或是它们的增长率是不是这样的指标呢？当然，这一指标的急剧下降或负值是反映某种异常，但它却道不出病因。相反，人为地把它限制在某一水平上也治不了真正的疾病。这就像人的体温，超过 39℃，健康必有问题，可能有种种原因；但是保持在 37℃，也并不意味着就健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都以 GDP 指标的提高作为主要依据。事实证明，以这一指标作为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水平的衡量标准的所谓“赶超战略”是不成功的。GDP 或它的实质增长率只是一种方便的指标，

而且是一个很粗糙的指标。国际上有关机构因此而提出新的指标体系来描绘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简言之,新的指标体系含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中的各种因素。再例如,我们要追求的“小康之家”,人们对它就颇有议论^[10],因为这不仅仅是以人均国民收入 800 美元或 1000 美元就能表示清楚的。之所以强调企业中的个人生产率,就是因为它是“生活-工作质量”这一概念的基础。我们主张,这是表示国民经济实态的真正指标,理由就是它才是真正联系到每个国民的工作与生活,而如果宣传得好的话,它又能使每个国民通过它形成对整个经济的实感。

既有活劳动又有物化劳动的生产率的主体是企业中活动的人。观察、测量、分析、提高生产率自始至终都要落实到这种人的身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生产率的研究历来都是对现象,或者宁可说是对汇总起来的数据进行的。而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研究生产率是对现象的主体——人进行的。当然,这两者不是绝对无关的,从前者可以看出后者的效果,从后者可以查清前者的原因。这就如同研究森林生态一样,既不能见木不见林,又不能见林不见木。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本研究中,这两种各占有一定的比重。

四

研究中首先感到困难的是作为管理研究所需要的经济理论的不足。生产率可以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有不同的侧重或强调,这些研究以及它的各种变体都有助于生产率提供的研究。这在古典经济学派,特别是在继承并发展了古典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十分清楚的。不过,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改革和开放日益深入的现阶段,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举凡经济体制、经济活动的各方面都有新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尝试解决,既能说明经济现象又能指导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尚待建立。因而,在研究生产率问题上通常所需要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些参数的确定就成了问题。不过,这种情况反倒促使我们更多地从概念的实质和管理的需要去考虑问题。在我们的研究中,许多方面都反映了这一点。

其次,统计数据也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是数据的收集问题,一方面是数据的处理问题。不论是从西方研究的标准看,还是从我们研究的需要看,公开的统计数据是残缺不全的,在某些年代也许还是不准确的。对此,有关方面曾有

过说明^[1]。不管怎样，我们将依靠，也只能依靠国家出版的各种统计年鉴。至于企业的生产率和有关数据，那就更难入手了。即便有一些，也不构成时间序列。我们只有参照某些报表加以综合判断。说到数据的处理，我们的原则是，不加任何修正。这是因为，与其恣意推测，反不如图其本来面目，也便于比较参考。其实，与此有关的是如何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进行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做法是采用定性分析指导下的定量分析和定量辅助下的定性分析。因此，由于现有数据的这种状况，我们的研究往往不得不采用定性分析去弥补，而不去修正数据以图直接改正或影响定量分析。

再就是术语的问题。已有国内文献在这方面好像有些混乱。有的可能是外国术语的翻译问题，有的可能是不同专业的差异问题。我们尽量不在术语上标新立异。但必须指出，术语本来有日常与专用之分，在我们的研究中，尤其是在涉及生产率的各种分类上，经济理论术语和统计、会计术语之间，将注意到学术研究术语与日常术语之间的对应和整合。

五

本书的研究和叙述先从对生产率的认识和整个有关的重要问题开始，再就它的定义和量度进行介绍，其中提出我们自己的观点和理论。据此，对我国的工业生产率作必要的分析，尽可能对它的轨迹和趋势，以及运动规律加以描述。最后，我们的讨论将落实到提高企业生产率的问题上来。关于本书的写作问题，各章的后面都附有相当多的注释，加起来约占本书篇幅的七分之一。这里面除了引用出处的注明，其他都是历史资料性的，因而也有作者对事对人所发的感触和评论。这些文字对读者也许有用或有趣，但写进正文会使文章变得冗长，因而作为注释处理了。

书中的第2章提出了“全劳动生产率”的新概念，第4章对劳动定额作出了新解释，并提出了企业管理上的新方法。这些都是作者从“以人为本”的管理信念出发的思索结果，也可以说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从粗放转向集约的基础理论。但是，数据显得不足，只能留待以后补充。不过，作者提出的方法论相信值得大家参考。

注 释

[1] 对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争论不断，尤其对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学者有怀疑态度，